



刘永济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的学科理念述论

王 炜 吴 慧

摘 要: 刘永济的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围绕着文学之名、之实、之事,建构了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理念。刘永济从中国传统的名实论、体用论着手,辨析了“文学”的概念、本体以及功用。他还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中提炼、总结出文学封域以及四纲、经纬、三准、三训、二义等概念,从语汇统系、理论统系等层面上为近现代文学学科确立了严密的理论框架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的学科理念,对探寻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。

关键词: 刘永济;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;文学史

刘永济的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作于1928年,初次出版于1945年。“这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”^①。在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,刘永济围绕着“文学”之名、之实,辨析概念,推求义理,建构统序,创制义例。这部书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与状貌还原融贯于一体,明确了近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根本理念。

一、“文学”的概念辨析

20世纪初,正值中国知识体系、学术体系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之际。“文学”学科也处于初创阶段,关于文学的本体、性质等问题,学界正处于协商、讨论之中。辨析“文学”之名,思考“文章之道”是学人的共同追求。

在对“文学”这个概念进行辨析时,刘永济的治学方法和诸家学者多有不同。近现代文学史家多谈文学的“定义”。如,谢无量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、凌独见的《新著国语文学史》、谭正璧的《中国文学进化史》等均谈到“文学的定义”。1919年,刘永济的《文学论》印行。在这部书中,刘永济也曾对“文学”进行“定义”。他说:

文学者,乃作者具先觉之才,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供献,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,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。^②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“学术渐有受世界影响之势”^③。刘永济说,在这种影响下,“今之人,莫不以科学方法相号召,故其治文哲学也,一若治科学者。先搜集物类,从而归纳之,论断之焉”^④。但是,他很快意识到,“定义”之法以及西方其它的治学方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,在文学研究中,如果简单地、武断地得出“定义”,容易对中国的学术发展进行生硬的切割。到了1928年,刘永济在写作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时,他不再试图对“文学”下“定义”,而是借鉴中国传统的名实论,对“文学”进行“正名定义”^⑤,从“名义”、“名谊”入手展开文学研究。

①程千帆:《刘永济传略》,载《晋阳学刊》1982年第2期,第35页。

②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中华书局2010年,第20页。

③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89页。

④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493页。

⑤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4页。

“名义”与“定义”，虽然只是一字之别，但是，两者却存在很大的差异。“定义”包含着确定性、稳定性，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之间是静态的对应关系。在“名义”、“名谊”中，谊、义有正当、合理之意。在“名义”这个词中，“名”与“实”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：

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，约定俗成谓之实名。^①

“名谊”、“名义”隐含着诸多问题。如，“名”与哪些“实”具有对应关系？在特定的场景下，“名”对应哪一类实才是正当的？“实”的性质、外在形貌如何？刘永济在治文学史时，从“名义”出发，对“文”这个“名”的多重含义进行深入的辨析，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论，从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向度上将“文”的多重内涵融会到“文学”这个概念之内。

在中国几千余年的文化传统中，“文”这个“名”累积了重重的涵义，指称的对象也非常复杂。“文学”、“文”的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不是恒定的，这个名对应的实的体与用之间也存在着多元的、动态的关联。刘永济本着“既长于考据，又长于持论，但不作声张”的治学方法^②，从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文心雕龙》等大量文献典籍入手，在事实、实证、考据的基础上，对“文”的内涵进行归纳、清理，厘定“文”这个“名”所指向的“实”。他说，“文之一名，涵义至广。昔贤诠释，约有六端”^③。“文”这个“名”的第一层涵义是“经纬天地”^④。据《说文解字注》，“文”，“错画也”^⑤。刘永济也说，“文之为训，本于交错，故有经纬之义焉”^⑥。刘永济谈到“文”的涵义，首列“经纬天地”之义，这是对《文心雕龙》以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承续。刘勰说，“文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有。“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”，“日月叠璧”、“山川焕绮”是“道之文”^⑦；“云霞雕色”、“草木贲华”、“林籁结响”、“泉石激韵”是“自然”之文^⑧；“唐虞文章”等是“言之文”^⑨。“文”的第二层意思是“国之礼法”^⑩。刘永济引《礼记·大传》及郑玄的注，另外，还引《国语·周语》，指出“文”一词在先秦时期指向的是“国之礼法”、“典法”等。“文”的第三层指向是“古之遗文”，即“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六经是也”^⑪。“文”的第四层意义是“文德”。“文德”与“武功”是异质同构的关系。唐代的李翱说，“非武功不能以定祸乱，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”^⑫。白居易也说，“国家以文德应天，以文教牧人，以文行选贤，以文学取士”^⑬。“文”的第五层意思是“华饰也”^⑭。刘永济说，“文之为物，又涵华采，故有修饰之说焉”^⑮。“文”经纬天地，无所不在，是天地万物、自然山川的客观呈现，也是它们的美和华采的呈现。“文”的第六层意思是，“书名也，文辞也”，即通过语言、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的作品。

刘永济在对“文”这个“名”进行辨析的基础上，进而提出，在近现代的学科架构下，文学之“实”——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：

要以第六为体，以前五为用。^⑯

从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上看，“文”的第六层涵义，即文辞、文章是文学最核心的要素。到了20世纪初期，知识要素的数量、规模、类型、范式等迅速累积和增长，刘永济说，如果依照“文”的六层涵义，不加辨析地确定“文学”的研究对象，“举凡天文地理，物曲人官，胥应涵盖无遗，遑论体例太宽，亦非理势所

①《荀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235页。

②吴志达：《两代大师的风范——刘永济、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》，载《武汉大学学报（人文科学版）》2003年第6期，第740页。

③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页。

④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页。

⑤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，第287页。

⑥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10页。

⑦詹锳：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，第2页。

⑧詹锳：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，第10页。

⑨詹锳：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，第12页。

⑩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页。

⑪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3页。

⑫李翱：《李文公集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，第1078册，第314页。

⑬白居易：《白氏长庆集》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，第453页。

⑭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3页。

⑮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10页。

⑯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4页。

许”^①。文学学科要确认自身的独立性,就必须把文辞、辞章、文章作为本体。文学学科的这一特定本体是在其他学科的参照下显现并逐步确认的。在近现代学术架构下,“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虽然需要借助语言文字表述出来,但其研究本体可以与语言文字无关。如,历史学科的研究本体,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记载的知识,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载体,如金石或断井残垣等承载的信息”^②。相较之下,“文学”研究的本体是而且只能是,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的文辞、辞章。刘永济还谈到,文学研究也不能摒弃“文”这个“名”指向的其他五重涵义。从“用”、从功能上看,“文”“在国则为文明,在政则为礼法,在人则为文德,在书则为书辞,在口则为词辩”^③。刘永济认为,“一民族、一国家已往文化所托命,未来文化所孳育,端赖文学。然则识鉴之精粗,赏会之深浅,所关于作者一身者少,而系于民族国家者多矣”^④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从名实、体用等层面着手,辨析了“文”、“文学”的概念、本体及功用,指明了文学与邦国的文明、礼仪、法度,与国家社会,乃至天地宇宙等形成了多重的、多形态的复杂的关联关系。

刘永济从中国固有的语汇体系入手,借鉴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方法,将“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”^⑤,对“文”这个概念进行区辨分析。在讨论“文”、“文学”的名与实、体与用时,“他从不作缺乏过硬文献资料的空疏之论,也不作缺乏理论深度的烦琐考证,没有套话、空话,力求陈言之务去”^⑥。“正名定义”是刘永济一贯的学术方法。他的《屈赋通笺》叙论部分有“正名定义第一”,从“名”与“实”的对应关系入手对“楚辞”展开讨论;他的《词论》也有“名谊”一节。“这种自觉的治学方法,使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创新精神。他的论著中既具有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缜密的考据之功,又有着鲜活理论深度,善于从不同的侧面、新的角度找准新的切入点”^⑦。借助于名实、体用这样的切入点,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明确地标画出近现代“文学”学科研究的本体及其内在的功能。

二、“文学”的理论建构

刘永济在对“文学”的名实进行辨析的基础上,进而从理论的层面上,阐明“文学”本体的基本状貌。他从中国传统的学术统系中提炼出核心的概念,并将这些概念重新组合,生成了全新的意义,为近现代“文学”学科的建构确立了严密的理论框架。

刘永济从“文学”本体入手,提出了“文学封域”这一概念。“封域”是中国文献典籍中常见的词语,这是一个与空间、地理相关的概念。刘永济将“封域”一词引入文学学科的架构之内,他说:

文家或写人情,或摹物态,或析义理,或记古今,凡具伦次,或次加藻饰,阅之动情,诵之益智,亦皆自然之文也。文学封域,此为最大。^⑧

文学的本体是辞章,但是,文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纯粹的、静态的文本,而是由这些辞章、文本构成的“文学封域”。刘永济谈到文学封域的基本状貌说:

文章之道,散为万殊,执要御繁,当有总术,必使杂而有统,约而不孤,庶几可以裁量大雅,研阅精微矣。^⑨

在文学封域内,辞章“散为万殊”,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,存在状态是零散的。但是,文学封域也具有整体性、自足性以及内在的规律性。我们可以从“总术”着手,把握文学封域。刘永济释“总术”说,“术有二义:一为道理,一指技艺。本篇之术属前一义,犹今言文学之原理也”^⑩。“文学”自有其特定的“原理”,

①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4页。

②王炜:《不必“执古”,不可“尊外”》,载《文学评论》2013年第4期,第170页。

③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10页。

④刘永济: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》,中华书局2010年,第169页。

⑤吴志达:《两代大师的风范——刘永济、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》。

⑥吴志达:《两代大师的风范——刘永济、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》。

⑦吴志达:《两代大师的风范——刘永济、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》。

⑧刘永济: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》,第2页。鲁迅的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、黄侃的《〈国故论衡〉赞》谈到文学,谈到辞章,也使用了“畦封”、“封域”等词语。后来,社会学、文化学中出现了“场域”这个概念,参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《论知识分子场及其创造性规划》(1966年)一文。

⑨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20页。

⑩刘永济: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》,第166页。

“文体虽众，文术虽广，一理足以贯通”^①。掌握了“总术”，“散为万殊”的文章就变得“杂而有统”，无论在数量上怎样繁多，在性质上如何繁杂，都可以统括于一体，并构建起特定的秩序或谱系。把握了“原理”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文章“约而不孤”的状态。“约”，据《说文解字注》，“缠束也”^②。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独立的，但是，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，而是在相互之间的缠束中构成“文学封域”。

在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，刘永济剖析了文学封域内在的、多向度、多层级的架构，建构了具有思辨性的、浓厚本土化色彩的理论体系。他说：

恢之以四纲，以统其纪；错之以经纬，以究其变；建之以三准，以立其极；约之以三训，以总其要；辅之以二义，以释其惑。文学之道，不中不远矣。^③

刘永济接续中国传统的宇宙观、统序观，从本土的诗学理论中提取核心要素，提炼、总结出文学封域以及四纲、经纬、三准、三训、二义等概念，并将之结构于一体，从语汇统系、理论统系等层面上明确了文学封域核心的建构原则。

“四纲”，就是“名义”、“体类”、“断限”、“宗派”。“四纲”是“文学封域”的四个维度，经由“四纲”，文学封域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自足性、有机性、动态性。“名义”就是名称。在文学封域内，散为万殊的“文”构成了不同的层次、断面、序列，每一层序均有其相对应的、特定的名称。“体类”，即文体、文类。刘永济谈到体类说，“类可旁通，故转注而转新；体由孳乳，故迭传而迭远”^④。文体、文类之间的关系，从静态的层级看，类下有体，体之下还含更多的体；从动态的演变看，体可能会演变为类，类可能会转化为体。“断限”即文章的时间维度。“文”是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存在，文学与特定时代的风会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。“宗派”着眼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。某些作家的作品在风格、立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，这些作家可以跨越时空、体类的限制，建构起特定的派别。

刘永济谈到“四纲”与“文学封域”的关系说，“恢之以四纲，以统其纪”。他借罔罟的纲、纪喻文学存在的状貌、体态。罔罟有一根总绳，张开来是中空的，可以包纳各种物品。文学封域由“文学”这一概念总揽，其中包藏着无限数量、无穷形态、无尽范式的辞章。文学封域的“四纲”，即四维的交互。借助于四纲，“散为万殊”的文章得以进行定位，因名义、体类、断限、宗派的会合点不同，每篇文章在文学封域内各有其特定的位置。

在确定文学封域的内在维度的基础上，刘永济还进而观察“文”——辞章的内在结构。他说，“错之以经纬，以究其变”。经纬本指布的经线和纬线。刘永济以“经”喻赋比兴，以“纬”喻真善美。他指出，赋比兴、真善美作为基本要素，交织、融会于每一篇文学作品中。无论赋比兴，还是真善美，各自都是三位一体的，“用之名三而实则一贯”^⑤。赋比兴，或者真善美的细微变化，造成文章的千变万化：

一体之内，或比兴互陈；一篇之中，或赋比兼备。或以赋而包比兴，或本比而用敷陈。参伍

错综，神变靡常，理固宜也。然而法有工拙，用有隐显，势有从违，体有大小。^⑥

布的经纬色彩各有不同，即使经纬的颜色不改变，如果编织方法不同，织出的花样也迥然相异。文章中的真善美、赋比兴正如布的经纬一样，变化万端。在不同的文章中，赋比兴、真善美交错的方法各有差异，随法、随用、随势、随体变化自如，从而文章也气象万千。

在刘永济的理论建构中，“经纬”和“四纲”还具有相互依存、相互参照的性质。刘永济说：

经纬者，……所以系纲维，贯纲目，纪理文心。^⑦

因经线、纬线或编结方法的相类，不同的文章与特定的名义、体类、断限、宗派等构成对应关系。在“文学封域”内，“经纬”与“四纲”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。“经纬者，取譬于组织”^⑧。对于文章来说，赋比兴、

①刘永济：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》，第167页。

②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287页。

③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40页。

④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4页。

⑤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5页。

⑥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3页。

⑦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0页。

⑧刘永济：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第20页。

真善美是每一篇文章的肌质,是文学最本质、最核心的要素。它们就像布的经线、纬线,经、纬细密交错,与布是浑然一体的,赋比兴、真善美也无法与文章切分开来,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文章的“组织”。相比之下,“四纲”则是辞章在“文学封域”中的定位方式,用来确定某篇或某些文章在“文学”这个统系中的位置。名义、体类、断限、宗派等都不是恒定的,名义是什么、体类如何、怎样断限、归于哪个宗派都可以重新建构、约定。一个作家,也可以抛开旧有的名义、体类、断限、宗派等自创新体、自辟新局。这样,由赋比兴、真善美“组织”而成的文学作品是静态的存在,但是,这些作品在“四纲”上时时发生着变化,从而文学封域具有了动态的性质。

三准是情、事、辞。刘永济所说的“三准”,源于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出的“设情以位体”、“酌事以取类”、“撮辞以举要”^①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,“三准”指向的是“文”与作者之间的关系。刘永济说:

第一项系指作者有什么思想感情要发表成作品;第二项则是作品中要说些什么事实或道理,才能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;第三项则是要用怎样的体裁、怎样的词句去描写这些事实或道理,才能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得分明易晓。^②

刘永济在《文心雕龙》的基础上,立足于近现代的学科构架,发现并阐明了“三准”的全新意义。刘永济指出,“三准”与文学封域之间的关系是:“建之以三准,以立其极”^③。情、事、辞三端共同标画出文学的边界。情,是作家的情绪、情感、情思、意绪等。事,是有形有貌的存在。刘永济说,“诗人之所咏歌,文家之所论列,史氏之所传述,必有事焉”^④。事,在诗中是物象、意象,在散文中是具体事件,在小说中是故事情节。辞,就是文字、文辞。文学是情、事、辞的统一。相较之下,历史、哲学著作有事、有辞,但排斥情;音乐、美术作品有事、有情,但无辞。这样,“三准”——情事辞的统一,划定了“文学封域”与历史、哲学、宗教,或美术、音乐等区隔开来的界限。

三训即承、志、持。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,“三训”是一以贯之的,关注的是文学的功能,文学在社会、人生中起到的作用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释“三训”说,“作者承君政之善恶,述己志而作诗,为诗所以持人之行”^⑤。孔颖达立足于作者的角度,确定作者的创作目的。刘永济则变换角度,以“文”为中心,阐发“文学封域”与人类社会、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:从文学与风会的关系看,文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,“必有关于一代政教之得失也”^⑥;从文学与作家的关系看,文学表达了作者的志趣,“必有关于作者情思邪正也”^⑦;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看,文学能调动读者的情绪,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,“必有感化之力也”^⑧。“三训”标明了文学封域与社会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联。

最后,刘永济谈到,要更清晰地把握文学封域,必须辅之以二义。第一义是,我们要把握,“情,公也。事,私也”,“作者之本事虽不可知,而文中之公情,自不难见矣”^⑨。“文学封域”中的作品可以因时、因势触动读者。第二义是,孔子所言“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,则寡尤”,“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”^⑩。刘永济申明,要葆有开放、包容的心态研读作品、从事文学研究、把握文学封域。

20世纪前中期,针对具体的文学学科建设的问题,刘永济指出,“今人之习西方文哲学,每喜以之拟我国语言哲学,而其不相类”^⑪。“中国是个文明古国,学术方面我们有一套,并不需要什么帮助。”^⑫吴芳吉谈到好友刘永济的治学路向时也说,“时北大方骛革新,举世趋之,诵帚若无睹也。数年,东南倡言笃旧,举世又复趋之,诵帚若无闻也。”^⑬刘永济在建构关于“文学”的理论体系时,本着不趋新、不笃旧的

①詹锳:《文心雕龙义证》,第1182页。

②刘永济:《释刘勰的“三准”论》,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》,第167页。

③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40页。

④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28页。

⑤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,中华书局1979年,第2页。

⑥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30页。

⑦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32页。

⑧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34页。

⑨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39页。

⑩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39页。

⑪刘永济:《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》,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512页。

⑫徐正榜、李中华、罗立乾编著:《刘永济先生年谱》,见《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》,中华书局2010年,第568页。

⑬吴芳吉:《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》,吴芳吉:《吴芳吉集》,巴蜀书社1994年,第428页。

态度,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词汇、概念、理论、统系进行清理,并提取核心的要素,阐明了文学封域的内在结构及其与世界的关联,为近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了坚实的理论体系。

三、“文学”的统序架构

刘永济在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,围绕着具体的文本,建构了文学的统序,梳理了文学的“史”的流变。涉及到文学史的书写,刘永济的态度是,关注“文学之事”,而不执着于文学之“时”。他说:

文学之事,流动不居,作者随手之变,世风习尚之殊,息息与体制攸关。^①

“史”的核心是“事”,书写文学史,其目的是要梳理“文学之事”。“史”与“时”也存在着直接的关联,书写文学史,不能剥离“时间”这个维度。但是,“时”只是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稳定的平台。“时”不是核心的要素,更不是建构文学史的唯一方式。刘永济不否认“文学”的“史”与“时”之间具有关联。同时,他也清醒地意识到,文学不是线性的发展。刘永济认为,体类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只是文学外形的变化:“常人见骈体至唐变成散体,古诗至唐变成今体,至宋变成词,词至元变成曲,遂以为此即文学之变迁”^②;“文学之变迁,不可据外形为准的”^③。刘永济认为,在讨论文学流变时,不能地过分地倚重体类、时代,严整地排列各个时代、各种体类的文学作品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与近现代诸多文学史著述的根本不同是:近现代其他各家大都关注文学的本体——文学作品之间的承递,重点在于审文学之“美”,而刘永济关注的是文学本体构成的“文学封域”,其特点是叙“文学之事”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将“文学”作为特定的、动态的“事”,呈现了“文学封域”多层次、多序列、多样态的统序架构。

刘永济梳理了文学文体、文学流派的发展,也剖析了文学作为特定的“封域”,其内部诸要素的交错、重叠、替代、转换、迁移,呈现了文学封域与自然、社会、人生之间的联结。在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封域以及“文学之事”的多重形态、多个层级。

“文学封域”中的作品既是相对静态的,也具有动态性,是“现时”存在性与历史延展性的综合体。刘永济在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论及某家、某体或某派时,往往融会诸多要素,交互旁通,全面勾画出文学存在的状态。如,在《诗经为感化文学之祖》一节中,刘永济论析了《诗经》的艺术特色。他进而谈到,《诗经》作者身份的复杂性,“贵自邦君卿士,贱至匹夫匹妇,莫不有作”;《诗经》的内容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联,《诗经》所述“上自王朝政典,下逮闺门委曲”。他还谈到,《诗经》反映了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详录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相关的条目:

郑国(中略)土狭而险,山居谷汲,男女亟聚会,故其俗淫。郑诗曰:“出其东门,有女如云。”

陈国(中略)其俗好巫鬼。陈诗曰:“坎其击鼓,宛丘之下。亡冬亡夏,值其鹭羽。”

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标明了诗风与时风、世风、民风之间的内在关系,还原了文学在特定时间、空间中存在的鲜活性。刘永济还引入类型、文体等维度考察《诗经》。他说,《诗经》“蕃衍滋益,独冠群经,而为后世感化文学之祖”,这是文学在类型上的延续。《诗经》“下及汉庭之赋,唐代之诗、两宋之词、金元之曲,莫不由此斟酌挹注焉”,这是文学文体的衍生、替代、转换。《诗经》“犹足资策士之游谈,助楚臣之讽谏”^④,这是文学对稍后时代的文化、政治产生的实际功效。

“文学封域”内的作品是被生产出来的,并由一个生产主体移交给另一个生产主体。如,诗最早即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歌谣,进而转移到廊庙之中。刘永济说:

诗体之源为歌谣,已成文学演进之公例。故东汉以后,五言体诗,其先皆民间歌谣。及采之乐府,歌之廊庙。文人才士,习其本辞,率相拟作。^⑤

在昔里巷流传之体,一转移间,已成廊庙酬唱之用矣。^⑥

①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11页。

②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30页。

③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30页。

④本段引文出自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第47—52页。

⑤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195页。

⑥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195页。

刘永济还谈到,“语体行文,虽盛于元世,实无代无之。宋人填词者,如柳耆卿、黄山谷、程正伯等,皆好以俚语入词,遂开元曲之端。白话小说,则起于宋代之平话”^①。

在文学封域内部,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精微莫测,变化万状。从名实之辨上看,在文学发展、演进的过程中,可能出现同名异实,或同实异名等情况,名实的对应甚至可能是“名”在不同维度上位移的结果。如,“论”作为一种写作方法,原本涵括极广,诸子皆可入“论”。但是,“丙部寢微,文集承燮。论名既专,其义始隘”^②。“论”不仅在维度上发生了转移,而且它所对应的“实”在规模上也逐渐减缩,“论”变为一种文体。刘永济拎出文学史上相类的现象,以确证这种变化。“赋”由“赋比兴”之一义,转化为“赋”这种文体:

赋之为用,广被众制。而屈、宋之作,乃擅赋名,所谓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者也。”^③

在文学发展史上,赋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,但它却产生了位移,而成为文体的名称。刘永济将“论”和“赋”的名实之变并置一处,这也让我们看到,在文学封域内,“论”和“赋”这两种相错但并不相交的要素,有时,竟在相同的轨道上运行。

文学是独立的“封域”,但不是孤立的存在。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上看,文学与其他统序之间具有多重关联性。如,文学、学术、地域文化、朝政之间就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多重循环关系:

战国晚季,学术宗主,大别之有三。而文学风气亦同其涂轨焉。(一)曰齐风。以理智为主,长于辨析推衍,而失则鹜于虚,以浮夸谄诞相尚,国卒不竞。(二)曰楚风。屈、荀词赋,其最著也。……以情感为主,长于敷陈讽谕,……能感人之情,而不能强人之志,而楚亦衰矣。(三)曰秦风。……政务实利,学主调和,商鞅、吕不韦,其最盛也。……以志意为主,长于指陈利害,……其失则刻酷寡恩,所谓政无膏润,形于篇章也。……宜其享国之不永也。^④

刘永济在《词论》中也谈到这种多重因果关系。他说,“自来论者未能通明,故多偏主,或依时序为分别,或以地域为区画,或据作家为权衡”^⑤。他提出,“言风会,则国运之隆替、人才之高下、体制之因革,皆与有关焉”^⑥,应该在时代、地域、作家才情、文学传统等共同构建的场域中,考察文学的发展流变。

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意在阐明“文学之道”、呈现“文学之事”,实涵括了文学之精深微妙。以上论列的内容,只是从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中抽取数条,仅见一端,而未得窥其全貌。但是,我们从中可以看到,刘永济把文学本体与文学事件、文学现象、文学活动、文学规律融会于一体。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突破了线性的时间之维,还原了文学封域复杂的、动态的平衡状态,勾画了文学封域与世界之间多元的连接方式。

刘永济的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以“认识文学之全体”为终极目的^⑦,他在辨析“文学”的概念、建构“文学”的理论、呈现“文学”的统序之时,将文学本体以及与本体相关的文学观念、文学流派、文学体类、文学断限、文学事件、文学活动、文学现象等均纳入研究的视域内,从文学之名、之实、之事等层面系统地勾画了文学封域的基本状貌。在文学学科已经定型的今天,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的思维模式、理论建构、学术理路、治学理念,对我们探寻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。

●作者地址:王 炜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;湖北 武汉 430079。Email:wangweihsxwy@mail.ccnu.edu.cn。

吴 慧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;湖北 武汉 430079。

●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(14BZW091);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(2014T70092)

●责任编辑:何坤翁

①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36页。

②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63页。

③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63页。

④刘永济: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,第67—第71页。

⑤刘永济:《词论 宋词声律大纲》,中华书局2010年,第49页。

⑥刘永济:《词论 宋词声律大纲》,第49页。

⑦刘永济:《文学论 默识录 附翻译小说 论文拾遗》,第21页。